

经济发展 → 人们要民主 → 社会动荡 → 经济停滞

↑
社会稳定 ← 专制 ←

第十三章 社会的现代化

大约自 17 或 18 世纪起,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这场变革首先发源于英国、法国等国家,然后以各种方式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人们将在这之前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将这之后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并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称为“现代化”。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对理解“现代化”过程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做一简单的介绍。

第一节 “现代化”的涵义、内容与特征

一、“现代化”的涵义

在有关“现代化”的文献中,“现代”、“现代化”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至少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不同涵义。

广义的“现代”一词,是被用来当作“目前”、“现在”、“今天”的代名词,被用来泛指人们正在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的时间阶段。在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的“现代”概念,具有一种相对的意味。按照这种理解,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在相对于以往都可以称之为“现代”。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就是无数的“现代”不断地转变为“过去”或“往古”,同时又不断地产生或迎来新的“现代”时期的过程。而狭义的“现代”一词则主要指的是大约从 17 或 18 世纪开始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在这之前的历史演变过程则被称为“古代”和“中世纪”或者广义上的“古代”)。例如,巴瑞(J. B. Bury)在他的《进步的观念》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宣称“现代历史开始于 17 世纪”。

就字面意义而言,所谓“现代化”就是指成为“现代”的过程。因



而,“现代”一词的双重含义不可避免地隐含了“现代化”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广义的“现代化”一词是指向任何一个更“新”的“现代”时期或状态的转变过程,因此“现代化”也就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乃至“第N次现代化”之类的提法。这种“第N次现代化”的说法显然就是在一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

狭义的“现代化”概念指的是十七八世纪(尤其是从工业革命以后)从欧洲起源,之后逐渐扩散到全球的、一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是从“传统社会”向这种新型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转变的过程。社会学中所讨论的“现代化”,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现代化理论”所讨论的基本上属于狭义的“现代化”。在本章中我们所讨论的也只是这样狭义的“现代化”。并且,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下面将只使用“现代化”一词,而将“狭义的”这一限定词略去。

二、“现代化”的内容

W.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这种过渡是以工业化过程为基础的。除了工业化过程之外,它还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 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2) 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是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促进流通的商品交换系统;(3) 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统治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4) 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5) 在经济政治方面,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相互依存的组织结构;(6) 在人口结构方面,过渡到低出生、低死亡、老龄型的人口结构;(7) 最后,在社会结构方面,是亲属群体和家庭功能的缩小与解体,个人主义化的进一步



加强, 妇女地位提高, 社会控制减弱等^①。

在《现代化的模式和问题》一文中, M. 列维也比较了“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 将二者的区别归结为以下九个方面:

(1) 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 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

(2) 在现代化社会, 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 各单位是相互依存的, 功能是非自足的, 而在非现代化社会, 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较强, 缺少功能分化;

(3) 在现代化社会, 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 而在非现代化社会, 由于家庭、亲属关系比较密切, 伦理具有个别的性质;

(4) 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 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则主要是专制的;

(5) 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 而在非现代化社会, 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

(6) 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 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和具有感情色彩的;

✓ (7) 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 而在非现代化社会, 即使有科层制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的社会关系之上的;

(8) 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 功能也不断缩小, 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 家庭功能也是多重的;

(9) 现代化社会的成员多数是生活在城市, 从事非农业生产, 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多数成员则是生活在农村,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②。

② 列维认为, 所谓“现代化”从社会结构上看就是从上述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向相对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

① 参见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 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12 页。

② 列维:《现代化的模式(结构)和问题》, 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第 117—124 页。



1960年欧美与日本学者在日本箱根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立了八项标准：(1) 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2) 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3) 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4) 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个人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个人活动领域的日益多样化；(5) 广泛普及文化知识；(6) 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7) 大规模的制度，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的存在，以及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的不断增长；(8) 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这样，“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使自己不断趋向上述标准的变化过程^①。

印度学者A. 德赛在《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一文中也从一个综合的角度对“现代化”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又简略的概括。他把人们使用“现代化”概念时所设想的实质过程综合性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领域的现代化。其主要内容是理性态度的出现以及由此导致的其他一些世俗主义精神的发展：包括不同于来世的现世态度；将人与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人文主义)；不轻信任何事物，对任何事物都提出疑问，对之进行理性的研究；不同于反对变革的、趋向变化的向前看的态度等等。

(2) 社会结构变化。现代化是个人行动与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它将个人充当的不同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和政治角色加以区分，并将他们与家族亲属之间所充当的角色加以区分，角色的征求也不是按固定不变的血缘、地缘、种姓或等级的归属来确定，而是以个人的成就为基础的自由流动。

(3) 政治变化。包括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世俗人民的

^① 参见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批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政治权力不断扩散到全体成年公民,中央行政权力不断增强,地理范围逐渐扩大等。 集权

(4) 经济变化。包括非生物性动力取代生物性动力,经济活动与传统环境相分离,机器取代手工工具,第二、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经济角色和经济单位日益专业化,日益增长的工业化等。

(5) 都市化程度不断提高。

(6) 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包括文化制度主要因素的日益分化;一种新的文化观的出现,它以强调进步和完善,强调快乐、能力自由发挥、感情自由流露,强调个性发展的价值观,以及强调效率为特征;一种新的个性取向的出现,它显示于人们对社会环境更大的适应能力,兴趣范围的扩大,自我信心的增强,对现世的日益重视,对他人的日益尊重和信任,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对按照个人贡献获取报酬原则的接受等等方面^①。

综合起来,可以说,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它实际上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其组成部分至少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专业化、高水平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科层化、参政范围的扩大、文化的世俗化、行为的理性化等等,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普遍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

三、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历史变革,现代化过程至少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 现代化是一个剧烈的转变过程。它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原有面貌,用一套与以往几乎全然不同的“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结构来取代了“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结构,以至于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断裂”。

^① 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3页。另见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9页。



(2)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变革过程。它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变。一旦某个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就必然会要求或导致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过程发生。这使得那些只希望在某些领域(如技术或经济领域)进行现代化,而在其他领域则维持传统面貌的现代化努力往往得不到成功。当然,由于起始条件、内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现代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展开的时序模式还是会有所不同。

(3) 现代化是一个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过程。然而由于它所创造的生存方式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生存方式相比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它一旦出现就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扩散到全世界。因此,迄今为止西方以外的国家中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这就又在非西方国家中引发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本土化”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4)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通过向世界各个地方扩散而逐渐将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卷入到这场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过程中来,并将它们联结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在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整体中,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是一些相对孤立的事件,都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迅速发生程度不一的影响。这使得对每一个卷入了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内”和“外”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了相对的性质。

(5) 现代化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由于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技术、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相似性将日益增加,世界正在日益趋于同质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威胁。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6) 现代化是一个功过并存的过程。从某些方面(如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方面)来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的福利。但从另一些方面(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活意义的失落、监督机制的严密、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增强等)来看,现代化似乎又是一个充满



风险的过程。这使得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始终构成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如影相随的重要成分。

第二节 理解“现代化”的主要理论模式

如何来理解“现代化”过程？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引发现代化过程的最初动力是什么？现代化的后果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在理解现代化过程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思想界或学术界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从而形成了“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不同理论模式。下面我们择其要者做一概括性介绍。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模式

马克思是最早对“现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现代思想家之一。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实际上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形貌。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的指引下，马克思曾经对“现代”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阶段。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机器大工业分工的产物。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围绕着资本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和运作，从而使“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分析了机器大工业在整个社会的结构或组织形式方面所引发的那些重大变革，如生产过程开始大规模集中到工厂当中，科层制逐步成为企业组织的基本形式；人口开始日益向工业化的城市集中；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基本阶级；童工和女工被大规模吸收进工厂，成年男性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家庭的功能进一步削弱，父权制家庭关系开始瓦解；劳动时间、生产操作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过程日益标准化、同步化；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乃至不同的地区日益联



结成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社会流动程度空前提高；等等。但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些变化都不能仅仅只从“工业化的逻辑”中去加以理解，而必须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描述和理解“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就必须同时要描述和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关制度。

马克思还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工业资本主义所隐含的内在矛盾以及未来演变趋势。他指出，资本主义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大限制，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要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所施加的这种限制，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此外，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导致了許多严重的负面社会后果，如阻碍了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趋势，造成了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导致了社会日益向两极分化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等，从而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必然导致工人阶级起来革命。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做的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马克思之后，有很多人继续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二、“工业社会”理论模式

理解“现代化”过程的另一种理论模式是建立在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工业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滥觞于孔德，经过斯宾塞、迪尔凯姆、帕森斯等人的发展而完善了。

孔德认为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工业化。孔德认为工业社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结果。孔德相信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是知识的进步。他系统阐述了著名的知识进步三阶段规律：即随着时间的演进，人类的知识形态不断地从神学知识经过形而上学知识再发展到实证科学知识。与知识进步的三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或发展。在实证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则是一种工业类型的社会。由于实证知识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最高阶段，工业社会也就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级形式。



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理论在斯宾塞那里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斯宾塞详尽地讨论了社会进化的形式和阶段,认为社会进化的基本趋势也是从结构分化程度低下的“简单社会”向结构分化程度较高的“复杂社会”转变。复杂社会可以有“工业社会”和“军事社会”两种形态,但“工业社会”似乎更是“复杂社会”的常态。

涂尔干(也译迪尔凯姆)则从劳动分工对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影响这个角度来探讨了现代化问题。

涂尔干指出,现代社会中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导致社会团结类型从“机械团结”(即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或“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而把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向“有机团结”(即通过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但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条件,缓和了人们之间或群体之间生存竞争的残酷程度,使人们可以在社会容量和密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以一种以往所不能比拟的程度和范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共同生存下去,而且还削弱了传统的集体意识对个人的控制力,拓展了个人意识发展的自由空间,促进了个性的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永不衰竭的活力和源泉。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然而社会团结类型的这种转型不会一帆风顺的。在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当与旧的团结类型相应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已经衰退,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规范尚未建立起来之时,社会就可能出现“失范”现象,从而引发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涂尔干认为,“失范”是社会团结转型过程中的暂时现象,随着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规范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就会重新步入正轨。

这种建立在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工业社会”理论模式,在20世纪中叶以帕森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那里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在其晚期著作中,帕森斯系统地阐述了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进化和现代化理论模式。他认为,社会是在不断进化的;社会进化的基本形式是结构分化;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系统功能未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社会进化的结果是增强社



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社会进化主要包括分化、适应性增长、包容和价值概化等环节；社会进化的历史方向是从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的初民社会经过若干中间社会再到结构分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社会；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可以用来度量进化成就的“进化共相”，它们一共有七项，即：社会分层制度、文化合法性、语言文字、权威的制度化、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普遍主义的法律、民主政体。初民社会只有前面两项成就，中间社会则有了前面五项成就，现代社会则积累了全部七项成就。由此可见，现代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进化的最高成就。

帕森斯的这一套“现代化理论”在斯梅尔塞、列维、艾森斯塔德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三、“理性化”理论模式

韦伯则提供了一个从个人行动和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过程的视角。韦伯认为，包括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等在内的全部社会现象都是个人行动的产物。人的行动主要有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性行动。西方国家的历史趋势是人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具有目的理性的色彩，目的理性行动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行动的主导类型，这就是人的行动的（目的）理性化趋势。由人的行动的（目的）理性化促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目的）理性化，从而导致了今天我们所称的“现代化”这样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

韦伯从生产技术、劳动组织、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国家治理等多方面，详细地考察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指出机器生产技术、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阶层分化、科层制的普及、高度形式化的普遍主义法律以及由专业化的文官依据法律来进行行政管理的现代国家等都是社会生活（目的）理性化的结果或表现。韦伯指出，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这些不同方面在历史上并非是同步而是分散或异步的过程，但只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程度（因而使得上述诸因素都充分具备了）的地方，才能实现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彻底转变。韦伯还指出，社会生活的上述（目的）理性化过程与人的行动的（目的）理性化过程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只有在人的行动已经高度(目的)理性化的时期和地方,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更为迅速的展开。资本主义或者说现代化过程之所以首先是在西欧国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新教伦理的出现使得新教教徒的行动具有高度(目的)理性化的色彩,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等现代社会因素的发展。

韦伯还指出,贯穿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精神及其各种表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劳资分化、官僚体制等),只是从目的理性这个角度来看才具有合理性。如果从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等)角度来看,则它又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铁笼”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个困境。

在韦伯之后,有很多人都试图从人的行动层面入手来理解现代化过程。例如,早期帕森斯就曾经用五对带有价值取向的行动模式变量来刻画人们的行动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他认为:传统社会中人的行动是以情感性、集体取向、特殊主义、先赋性取向和扩散性取向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行动则是以情感中立、自我取向、普遍主义、自致性取向和专一性取向为特征的。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试图说明,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把人的现代化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能够接受新经验,对创新持开放态度;(2)具有提供和坚持意见的能力;(3)具有民主倾向;(4)计划性强,时间观念较强;(5)对人本身的能力较有信心;(6)普遍的信任感;(7)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的原则;(8)相信科学技术的作用;(9)接受现代教育,追求新机会,乐于冒险。英格尔斯还认为西方人大都具有“现代人”的品质,因而他们较早实现了现代化;非西方社会的人多不具备“现代人”的特质,因而现代化进程缓慢。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先实现人的现代化。

四、吉登斯的多维现代性理论模式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理性化都分别只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之一,或者说,是现代化过程的内涵之一。它们都不能单



独解释整个现代社会及其现代化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现象。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过程。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既包含着上述制度又不只是上述制度的多维度的整体,具体地说,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或维度:(1) 工业化,即人类主体通过劳动分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对自然以及人类的主体行动所创造的环境(“被造环境”)的改变;(2) 资本主义,即在竞争性的劳动与产品市场条件下资本的积累;(3) 监督系统,即对信息的控制与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监督制度;(4) 军事力量,即在现代战争本身的高度工业化技术化条件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这些制度性维度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吉登斯强调,尽管从时间的发源和由于民族-国家与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建立而滋生出来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说,现代性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东西,但是现代性所意味的制度性转变,并不只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具有全球化倾向的趋势。吉登斯从上述四个维度将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诸因素简要地概括为: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系统和世界军事秩序。

吉登斯还从上述四个制度性维度考察了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利益,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而且,由于和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在时间-空间上的高度延伸,使得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可能遭遇的风险也具有远比其在前现代条件下更为严重的后果,尽管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吉登斯从上述四个制度性维度出发,将人们在现代性或现代化条件下所面临的风险描述为:生态环境的衰变,经济增长机制的崩解,极权的兴起以及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核战。

五、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两层次现代化理论模式

哈贝马斯认为上述所有有关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理论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它们都只是描述和看到了“系统”这一层面上的现代化过程,而忽视了“生活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因而也就更不能从



“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中来对现代化过程进行考察,不能对现代化过程做出全面准确的描述和理解。

哈贝马斯接受了韦伯关于“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行动与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观点,但他认为韦伯以及韦伯以来人们对“行动”及“行动理性化”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褊狭。韦伯以来的现代化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从“主体-客体”之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将人的行动只看成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单方面地认知和利用外部客观世界来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过程。这样来观察人的行动,自然就很容易看到人的行动从各种非目的理性类型为主向目的理性类型为主转变这样一个方面。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除了处理人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之外,人还必须通过沟通的方式处理作为主体的自己与同样作为主体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主体”关系或“主体际”关系。因此,除了处理“主体-客体”关系的那些行动之外,人的行动还包括处理“主体际”关系的沟通行动。行动的理性化也就既包括了前一种行动的理性化又包括了沟通行动的理性化。前一种行动的理性化过程,就是韦伯所说的从各种非目的理性行动类型为主,向目的理性行动类型为主的转变,沟通行动的理性化过程则是指人们越来越多的通过自由、平等的理性讨论来达成共识和处理相互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层面上,非沟通行动(目的)理性化的结果是导致了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整合起来的现代社会“系统”的形成。但这只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层面。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另一个层面则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所谓“生活世界”指的是相互交往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的一套背景资料或知识库,“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则指的是它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普遍性和反思性。“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与沟通行动的理性化紧密相连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过程本来包括“系统”的理性化和“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两个方面,其中“系统”层面上的理性化提高了人们的生存能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则为“系统”的理性化提供文化、规范和人格基础。但随着现代化过程的进一步开展,“系统”层面的发展逐渐超过乃至压制、扭曲了“生活世界”的发展,从而导致了金钱和权力



主宰现代社会的局面。要使现代化能够健康进行,就必须重新确立“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大力促进“生活世界”的发展,使整个社会重新建立在通过理性的沟通行动过程而形成的“生活世界”基础上。

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

与上述所有理论模式不同,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德和罗蒂等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以彻底批判现代性/现代化为己任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或“现代化”从根本上加以质疑,否定“现代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性”作为人类最高价值标准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者一般都接受韦伯的论断,认为“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的全面(工具)理性化。现代化说到底依赖于人类借助于(工具)理性来实现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控制能力的增长。“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这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控制能力的增长,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规模征服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它对人类自身的持续生存造成了威胁;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有效控制则使人类本身陷入全面的、无所不在的被监禁和被支配状态之中;科学、理性取代传统和宗教成了惟一的、不可抗拒的合法性准则,因而也就成了支配-被支配关系的新的基础。据此,“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是一项失败的工程。“后现代主义”者们竭力抨击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础,试图推动一种建立在比单一的理性更为宽广的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新文明——“后现代世界”的出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现代化所做的批评,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已有的现代性及现代化模式的弊病。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有一定的警醒意义。

以上介绍的只是有关现代化过程的几种最主要的理论模式。比较起来,这些模式中的每一种都各有千秋,既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它们为我们理解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值得我们去作更深入的探讨。



第三节 后发展国家及中国的现代化

按照“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作为一个集中的论题，现代化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而提出的。或者说，现代化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点上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处于非常不同的国际空间秩序当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进行“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条件，这对它们各自“现代化”过程的内容与形式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使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在内容与形式上产生一些重大的差别。在本节中，我们将对所谓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做一简单描述。

一、“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点

迟发展效果

1. 发展逻辑的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经对“后发展”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相对于“早发展”国家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做过详细的论述。他把“早发展”国家称之为“内源发展者”，把“后发展”国家称之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他认为，相对与“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后来者”具有五个方面的优势：(1) 他们不是在未知领域内探索，因而对于自己的行动方向能够具有更为明确的概念。(2) 有可能直接采用和借鉴早发现代化国家已经形成的计划、技术、设备和组织模式。(3) 存在着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性。(4) 后来者国家的领袖可以通过展示其他国家或地区已达到的成绩而加强其领导。(5) 可以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获得资本和技术上的帮助。

然而，另一方面，“后来者”也面临着许多不利的因素：(1) 为了进入现代化过程，后来者必须一开始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从事许多事情。(2) 为了缩短与已现代化国家的在发展程度上的距离，后来



后发展的缺点... 滞后=无结构的普遍存在
对现代化的抑制与震荡

② 社会结构的集中化与分化
同时出现并相互制约

者们往往需要使自己的生产能源、材料、技术等**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转变,使之能够接近早发现代化国家已有的水平。(3)迅速赶上已现代化国家的高期望,与后来者同早来者之间实际上可能始终存在的发展距离,很容易在后来者国家的人民中引发失望情绪^①。

② 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失调
→ 先物后制
度文化社会

列维认为,后来者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这些不利因素,使得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不具有许多与早发现代化国家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大规模行动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无法靠民间私人力量在短期内迅速积累起来,必须要有国家的介入,二是因为大规模的行动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迅速的社会变化也需要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和协调。此外,后来者要想在短期内在能源、材料、技术等的改变上尽快接近已现代化国家现有的水平,主要依靠从后者采借、引进的方式,由此所需的大量资金在短期内也只有靠国家之力才可能获得。

2.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特征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科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格申科伦指出,落后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时,虽然可以通过采借先进国家成果的方式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因而存在着潜在的优势,但是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因此,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在这些条件形成当中,一些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他以筹措和分配工业化所需要资金方面的制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是工业化过程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越具有渐进的特征,资本积累的问题就越不突出。比如英国,它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最初是从商业和现代化的农业中得到的,然后是从工业自身的发展中逐步筹措得来的,这些工作可以由企业自己来完成。相反,在落后国家中一方面资本极其缺少,另一方面却往往一开始就要从

^① 列维:《现代化的模式(结构)和问题》,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25—127 页。



事规模庞大的建设,使资金供求差距扩大,从而要求有比企业更为有效的组织来为资本的形成创造条件。落后国家之间又有落后程度上的差别,在中等落后国家,如当时的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可以通过银行等金融组织的建立来积累和分配资本,组织工业化过程。而在一些非常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俄国,连银行也无法筹集到在短期内进行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足够资金,这样工业化就要求一种更为有力的组织即国家来承担资本形成的任务。格申科伦指出,尽管由国家来承担筹措资金、组织工业化过程的任务会有许多弊端,但却是落后国家为加快自己的发展所必需的^①。

3.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特征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所具有的特点。亨廷顿指出,与早发展国家已经形成的稳定而有效的政治系统相比,后发展国家中却普遍存在着政治不稳定的问题。他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稳定状况不是源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低,而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他指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人民大众广泛地被动员起来并被吸引到经济、政治活动中去,这种广泛的动员产生了对之进行有效整合的新问题,它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使被动员起来的各个群体都能在其中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又能使这些群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的调节、限制和疏导,使所有的社会势力都能够和谐共存。然而,后发展国家的困境是,这样一种制度建设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这样,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此外,亨廷顿还指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还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会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这虽然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机会,但也由于将各种

^① 参见格申科伦:《从历史的观点看经济落后》,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28—848页。



矛盾在同一时刻集中了起来,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亨廷顿认为,为了降低政治的不稳定性,维护社会秩序,也为了应付“同时性”现代化所提出的严重挑战,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高度有效的中央政权存在,由它来组织和控制整个现代化过程^①。

概括上述几个学者的说法,可以看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时间短、规模大、内容多(所谓“一揽子解决”)、社会动员程度高等特点,它在资金的筹措、行动的协调、过程的控制和秩序的维护等方面都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者、组织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这些要求,民间的私人力量不可能给以满足;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成为这些要求的满足者。

二、社会趋同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论述

1. 社会趋同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学家和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时形成了社会趋同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化过程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尽管各国现代化的国情不同,起点也不尽相同,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式可能会各有不同,但它们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并形成大体相同的社会特征,即经济上的工业化^①、政治上的民主化^②、组织管理上的科层化^③、城市化和文化的世俗化^④。这就是社会趋同论。按照这种看法,“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只是“现代化”这一普遍发展道路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距,是因为他们处在现代化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只要“不发达”国家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努力克服自己内部各种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从各方面追赶发达国家,最终就会变成和现今的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社会趋同论的理论基础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性,它

^① 参见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7页。



所受到的批评是认为它忽视了文化的作用。

2. 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以拉美学者为主的学术潮流,它基本上是关于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利的国际关系的障碍,及其发展道路的一些看法。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雷维什、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等人。

普雷维什、弗兰克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并不是一个普遍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同一发展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发达”正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为前提或为基础的。造成不发达国家之“不发达”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以及由这种依附所导致的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一般认为,阿根廷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普雷维什是“依附理论”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普雷维什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提出的发展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缘(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组成。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缘国家,从而导致了后者的不发达。

20 世纪 60 年代,弗兰克进一步引申和发展了普雷维什的观点。他用“宗主-卫星”这对概念来替代“核心-边缘”这对概念。他认为这种“宗主-卫星”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世界层次,而且也存在于每个卫星国家的社会内部:这些国家的中心城市构成世界层次上其他某个或某些宗主国的卫星,但对于该国内部其他一些地方性城市来说,这些城市却又具有宗主的地位。这种“宗主-卫星”之间的连锁关系,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宗主-卫星”体系,其中每一个宗主都从自己的卫星那里吸收资本和经济剩余,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输送到更高的宗主那里去。这种“宗主-卫星”之间的连锁关系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将它们的控制力量渗透到不发达国家的任何角落。弗兰克还提出了系列有关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理论假设,其中最主要的四个假设是:

第一,与本身不具有卫星性质的宗主相比,国家或更低一级层次上的宗主其发展会受到它们自身兼具的卫星地位的限制;



第二,当处于卫星地位的国家或地区与其宗主的联系减弱的时候,这些国家或地区反倒能够出现最迅速的发展;

第三,一旦宗主国或地区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并恢复与其卫星国或地区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联系,后者先前的工业化进程就将遭受抑制;

第四,最不发达和最为封建的地区,往往是曾经与宗主国有过最为密切的联系^①。

由此,弗兰克得出结论,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取得发展,就必须摆脱或削弱自己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另一位著名的依附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对此做了较系统的阐述。多斯桑托斯区分了“依附”的三种历史形式或阶段。第一种形式是“殖民依附”,即殖民帝国通过商业和金融资本的入侵,垄断对殖民地土地、矿产和人力资源的控制权,以及殖民地金、银等矿产和初级产品的出口,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贸易来直接榨取殖民地国家的利益。第二种形式是“金融-工业依附”。它出现于19世纪末期。在这种形式下,依附国的经济依然为宗主国的大资本所主导,并且主要依靠向欧洲国家出口后者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农产品来维持,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某些特殊出口生产部门为主、其他辅助性的经济部门为辅的特殊生产结构。依附的第三种形式则是“技术-工业依附”。这种形式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这一时期,工业虽然开始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但却受到了许多结构性的限制,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存在着对发达国家的严重依附。

殖民依附

金融-工业依附

技术-工业依附

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依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卡多索、伊文思等人。这些人也用“依附”来解释不发达国家的落后,但他们并不认为处于“依附”状态中的不发达国家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希望。卡多索就认为,只要把外资、本国资本和国家力量三者合理地结合起来,不发达国家还是有可能取得经济增长,形成“依附性发展”。

外资 + 本国资本 + 国家力量

① 参见 So, Alvin Y. 1990: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Theor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97—98.



这种“依附性发展”虽然不能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的依附性结构,但可以为最终摆脱依附开辟道路。为了与弗兰克等人的观点相区别,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依附发展理论”。

“依附理论”揭示了国际环境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不利影响,这是它的可取之处。但“依附理论”过于强调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过于忽视对国内因素的研究。这使它受到了人们的批评。

3. 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沃勒斯坦在批判继承“依附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基本思想: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1) 整个世界是一个以经济为实体、以世界性区域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简称“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有着自己的整体运行规律。

(2) 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在体系中履行着不同的经济职能;“核心”国家或地区的职能是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或地区输送制造业产品,边缘国家或地区的职能是向其他两类地区输送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半边缘国家或地区的职能则是向核心国家或地区输送“边缘产品”,向边缘国家或地区输送“核心产品”。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3) 所谓发展就是改变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从边缘位置向半边缘位置或从半边缘位置向核心位置开迁。因此发展的目标是相对的、变动不居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这种发展要受到世界体系整体结构的制约。因为核心位置总是有限的,多数国家或地区只能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位置,而新的核心国家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老牌核心国家或地区的衰落,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个别国家或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虽然可以改变,但由核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层次构成的整个世界体系的结构却无法改变。

“世界体系理论”综合了重视内部因素的“现代化理论”与重视外部环境因素的“依附理论”两者的合理之处,因而具有更高层次的合理性。“世界体系理论”既看到了阻碍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利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核心

半边缘

边缘

相互依赖

发展

(相对)



因素,但又指出了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起来的可能性,因而能够较好地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世界体系理论”一直都对发展研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三、中国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很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化的阶段、现代化的迟缓乃至挫折等方面的研究。参照罗荣渠等人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自19世纪中叶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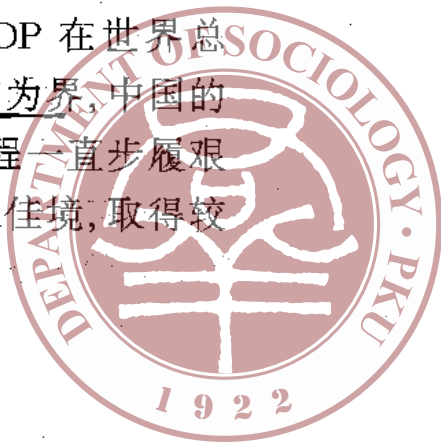
第一个大阶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洋务运动经维新变法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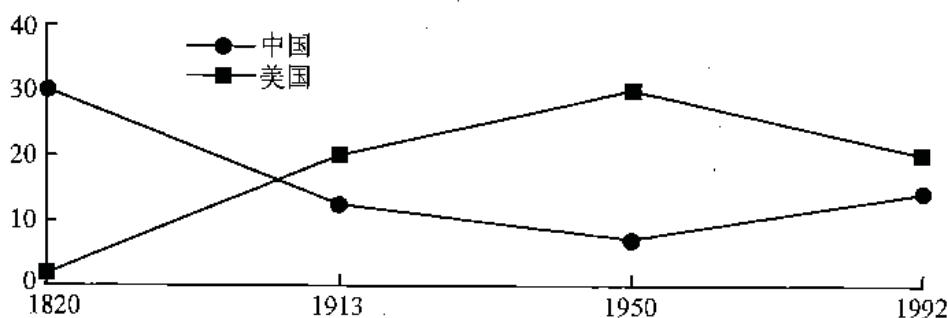
第二个大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这是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时期,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被挤压在一条窄缝中断续地进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趋于半边缘化。

第三个大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开始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

第四个大阶段是从1979年迄今。这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工业化开始逐步进入罗斯托等人所说的“起飞”阶段,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得到更进一步的推进。

检视一下有关的历史资料(如下图所示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以1950年左右为界,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对比鲜明。1950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步履艰难,成效甚微。1950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步入佳境,取得较大的成就。





1820—1992年中国和美国GDP占世界总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两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133页;转引自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前述关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之特点的论述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后发型”的现代化。正如列维、格申科伦和沃勒斯坦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它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只有当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并能够对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过程的广泛控制和指导时,其现代化过程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而1950年代以后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的有计划的控制和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走到20世纪后半叶,之所以终于走上了以国家主导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这条道路与中国这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最初的制度需要最为吻合。如果不是后来产生了许多干扰“现代化”过程的事件的话,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当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当然,和其他一些后发展国家相比,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政权在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控制是全面和严密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展性质相关。正如格申科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经济落后的程度和“后来”的程度有所不同,同样是“后发展”类型的国家所遭遇的上述内外矛盾的严重程度也就会不同,因而其所面临的由国家来组织、推动现代化过程的需要、压力以及必要性也



就会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成功的走上了现代化旅途的“后发展”国家中,虽然都运用了国家的力量来组织和推动自己的现代化,但各自对国家力量的运用程度却是有所不同的,具体表现为国家力量对社会过程的控制程度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越是低下,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间越是迟后的国家,其所遭遇的上述内外矛盾的尖锐程度也就越高,所面临的由国家来组织、推动现代化过程的需要、压力和必要性也就越高,在日常社会过程中国家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控制程度也就越高。中国在20世纪初正式启动现代化,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摸索,中国终于选择了相对而言国家在社会过程中所起作用最大、对社会过程控制程度最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历史的经验表明,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之初“后发展”国家确实需要有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通过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直接介入来帮助现代化过程的启动和推进(缺乏这样一种推进力量,将会使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但这种直接介入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却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永恒的。在现代化进程之初,由于工业化的程度不高,社会整体生产规模不是很大,结构也还不是很复杂,许多生产建设也主要是以基础性建设为主,“后发展”国家中薄弱的民间力量一般难以承担,因而国家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既有必要也有实效。但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结构日益复杂,许多基础性建设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社会经济过程的必要性与效率便都会开始下降。此时国家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直接介入就可能不但不是现代化的推进因素,反而成为现代化的阻碍因素。此外,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直接介入也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全面而严密的控制和介入,会导致个人自由活动空间的消失、社会自身发展活力的窒息、严重的官僚主义等弊端。因此,当现代化推进到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弱化国家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直接控制,增加民间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权与活动空间,就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举措。这也就是1979年以来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现代化的战略选择问题上,国际上出现过以经济增长为主的传统发展战略,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的基本需求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国际思潮的影响,但是中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慎重地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

在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曾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为什么屡遭挫折,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研究,这里只简单介绍几种观点。

韦伯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作用。韦伯认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新教)不同,新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强调人伦和道德,强调适应此世,因此,尽管中国具有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也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列维从家庭制度方面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在比较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时,他认为,同是东方国家,日本较快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却没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家庭制度不同。首先,在中国家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价值的至上性使得利用家庭为社会服务的可能性很小,而在日本家庭在很多方面可以为社会所用。另外,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使人们不会一心一意地从事商业活动,在日本,社会结构是封闭的,商人之子恒为商,这使他们专心经商。还有,在家庭财产继承方面,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而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中国不利于财富的积累。

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在现代化初期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力量、缺乏有效的权威、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等角度分析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原因。

第四节 “后工业”时代与现代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了一系列与以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似乎不同甚至相反的演变趋势,如服务或信息业的生产总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



重超过工农业、知识与知识阶层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地位增高等。围绕着这些新变化,西方学者展开了一系列观察、描述和分析。在本节中,我们主要对其中的部分代表性说法做一简要的介绍。

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是最早对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做出系统性描述和分析的学者之一,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就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今后的30—50年里,人们将会看到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社会形式出现。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有着许多与以往工业社会不同的新特点。其中主要包括:

(1) 服务性经济的创立。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其中保健、研究、教育和管理部门就业人口比重的增长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2) 专业和技术阶级占据优势地位。在后工业社会,从业者比例增长最快的职业是那些通常要求从业者受过大学程度教育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职业,如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疗保健人员以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又以工程师和科学家增长得最快。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生活中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3) 理论知识的首要地位。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与经验知识相比,理论知识开始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占据首要位置,并且成为各种革新的首要源泉。与此相应,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社会的中轴结构。

(4) 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各种新的预测方法和探测技术的发展,人们有可能对技术的发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规划和控制,从而减少技术发展的负面后果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

(5) 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在后工业社会,一些能够用于处理包含着大量相互作用之变数的复杂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如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概率论以及使这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际应用的



计算机技术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随着这些新智能技术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就能够对社会的运行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①。

在贝尔之后,又有一系列类似的描述出现,如松田米津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理论、斯科尔的“知识社会”理论和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等。这些描述的共同特点是,将关注中心从以往的资本主义制度转移到技术变迁以及由技术变迁所引发的那些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上来,甚至认为随着这些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逐渐消退。

2. 拉什的“去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在其与厄里合著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这个不同的角度对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做了描述,他主要关注西方社会的组织化的变化。

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有如下特征:工业、银行和商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市场的日益增长;白领阶级,尤其是一个由各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科学家所组成的独特的服务阶级的人数不断增长;由于经济日益“去工业化”,核心工人阶级(制造业中的操作工人)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重都不断减少;在工业关系中,国家一级的集体协商程序的重要性的效果日益减小,公司和工厂一级的集体协商程序的重要性的效果则日益增长;大垄断公司日益从单个民族国家的直接控制和约束下独立出来;普遍主义的福利性国家立法的发展,以及来自左右两翼对集中化的福利国家的实质性挑战;资本主义日益散播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此导致第一世界国家的职业结构从以工业部门为主的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各个政治党派的阶级特征日益衰减;文化的碎片化和多元化色彩不断增加。与此相关的时-空距离上的压缩(如“全球村”)不断瓦解着各种民族性主体的结构;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民族-国家的数目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部门数目的巨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恬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7页。



大增长；制造业部门雇佣人员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以及这些部门对社会组织化的意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断降低；各种新的区域劳动分工形式相互重叠，减弱了不同的生产部门在不同地区集中的程度；工厂的平均规模不断缩小；工业化城市在规模上以及在所在区域中的统治地位开始降低；一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意识结构的产生和传播。

拉什与厄里认为，这些变化使得资本主义正在从以往那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去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结构、阶级结构和文化状况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3. 西方社会的“后现代化”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克鲁克、帕库斯基和沃特斯撰写的《后现代化》一书则从文化、国家、社会不平等、政治、工作组织以及科学和技术等六个方面描述了西方发达国家中正在出现的新发展趋势与以往现代化过程之间的主要差别。

第一，从文化方面看。现代文化的基本演变趋势是它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活动领域的分离以及它内部不同活动（认知、道德评价和审美等）领域之间的分离。相反，当前出现的文化演变趋势，则是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活动领域之间以及文化内部各分支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不断趋于消失。

第二，从国家方面看。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是国家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步具有一种中心性的支配地位。国家是主权的拥有者、市民权利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企业的管理者等，担负着内外环境的稳定、经济调控、基础设施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等多种功能 and 责任。相反，当前出现的新趋势却是国家的职能日益收缩，国家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下降，国家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自主性实体的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权力分配日益呈现出“逆中心化”的态势。

第三，从社会不平等方面来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所造成的，阶级差异和性别差异是不平等的两种主要形式。而在新出现的趋势中，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日益缩小，各种分散的小型经济组织的不断增长，一



方面传统的科层等级制度正日益瓦解；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日益被更多地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被贫困化，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日益衰落。家务活动和公共活动的界限也日趋模糊，从而使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也日益缩小。由于这些变化，物质生产过程在社会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缩小，社会不平等将主要通过消费过程来体现；阶级也将逐步为各种认同群体所取代。

第四，从政治过程方面来看。在现代社会中，政治过程是以社会经济过程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为内容而展开的（利益政治），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阶级（阶级政治），政治活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组织化政治），大型政党则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政党政治）。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过程的特征。新的政治过程不再是以社会经济过程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而是以一些更为普遍关注的如价值观或生活风格、全球环境之类的内容而展开，政治活动的主体不再是那些以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为基础而形成的阶级群体，而是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社会范畴，政治活动也具有更多的偶发性和更少的组织性，社会运动日益取代大型政党而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第五，从工作组织方面来看。现代生产系统的主导模式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它是为了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是以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为技术基础，以标准化、持续化、高强度、任务简单化和分工固定化的劳动过程为特征，以严格的科层系统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在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正在日益受到挑战。大众市场的激烈波动使以大量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模式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许多与新的市场环境更为适应的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如小型企业、转包制、灵活分工制等不断涌现，成为“福特主义”的替代模式。其中“灵活分工制”被认为生产过程“后现代化”的先锋或主流趋势，它以计算机控制的技术为基础，能够灵活地响应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以去中心化和去科层化的管理系统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在数量和功能上多样可变的劳动力市场为条件。从“福特主义”向“灵活分工制”的转变是新社会转型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从科学和技术方面看。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是高度组织化的:它在财政和机构两个方面都被高度整合进企业和国家体制之中;科学研究内部的学科界限以及它与其他社会活动,如市场交易之间的界限是严格的;科学作为人类控制自然这项大工程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泛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而在当前西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大型企业和国家财政能力的不断衰退,科学也面临着“去组织化”的严重压力;科学内部的学科界限以及科学活动同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科学的自主性正在日益受到威胁;随着气候恶化与环境破坏现象的日趋严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程度也在日益下降,科学本身甚至被视为对人类的一种潜在威胁。

克鲁克等人认为,西方社会尚处在向新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式的具体细节尚无任何确切的知识,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个新社会形式不是以往的“现代社会”。因此,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他们主张最好使用“后现代化”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只是描述了一种过程,即从所谓“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它表明我们目前应该讨论的只是正在产生“后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而不是这个新社会形式本身^①。

4. “消费社会”论

D. 莱恩则明确地使用了“后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当前的西方社会。不过莱恩认为,尽管“后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景观,如灵活的生产、职业结构的巨变、时空的压缩和新生产技术的出现等等,但理解“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线索还是存在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新消费者的创造之中。莱恩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后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则是消费以及需求和欲望的生产。“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新现象如生活风格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的多样化、雅俗文化界限的消失、认同政治对阶级政治的取代、“模拟世界”的创造等等都是围绕着消费过程而建构起来的。因此,莱恩说,如果后现代性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消

^① Crook, S., Pakulski, J., Waters, M. 1992: *Postmoderniz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费社会^①。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 尽管西方学者们的描述形形色色, 不尽相同, 但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正在发生广泛深刻的变化, 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些变化不仅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问题(如如何来重新界定“现代化”的概念等), 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实践上的新问题(如这些变化对我们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因而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推荐阅读书目】

-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 抗拒与社会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 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索》,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个人现代化: 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权威取向、创新精神
 城市现代化: 祥和、尊重、自信、信任

① David Lyon, *Postmodern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8.

